

## 目录

### 77级毕业论文选登

苏加诺的平衡政策及其失败	唐文方	1
津巴布韦：回顾与前瞻	潘琪	16
评里根政府对西欧的政策	马菽	30
伊朗巴列维王朝覆灭的社会原因	董秀丽	42

### 译文

#### 印尼共产党与一九六五年十月一日政变

[美]雷克斯·莫蒂默 梁英明译	52
-----------------	----

#### 共产国际和印度政治

[印度]V·S·巴德赫拉吉 昌竞茹 刘苏里 殷真译	66
---------------------------	----

#### 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苏联社会结构

[苏]C·谢尼亞夫斯基 陈风翔译 章亚航校	81
-----------------------	----

### 教学参考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教学大纲	国际关系教研室	102
--------------------	---------	-----

## 苏加诺的平衡政策及其失败

唐文方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爆发了一次政变。在总统府警卫营营长翁东中校的领导下，处决了六名政府中的军队高级将领，并企图建立一个“革命委员会”来控制国家政权。原陆军战略预备队司令苏哈托为首的右派军人很快镇压了“九·三〇运动”，逐步剥夺了苏加诺总统的权力，建立起军人政权，印尼共产党人随之遭到大规模的血腥屠杀。

九·三〇运动的动机是什么？它的策动者属于哪个政治派别？又得到了谁的支持？评论家们对这些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既然是考察一个历史事件，就应当把它与前后发生的其他事件联系起来，而不是孤立地、就事论事地进行说明。只有作为历史线索中的一个环节，它的意义才能够显示出来。过多地争论那些至今也搞不清楚的技术性细节问题，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这种研究无论多么细致和深入，也只能是见树不见林。

与其他研究印尼这一时期历史的文章不同，本文将略去对九·三〇事件及军人政权建立的具体细节的讨论，试图通过分析印尼独立前后国内的一些主要政治、经济情况来说明苏加诺的政治平衡政策及其失败的必然性。

### 一、历史背景及苏加诺早期的活动

十九世纪后期，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殖民地作为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资本输出的场所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一八七〇年以后，外国资本开始大量涌入党属印尼殖民地。印尼的土地上出现了荷兰和欧洲列强直接经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大种植园和近代采矿企业，以及铁路、轮船等近代交通运输设施。

殖民统治的变化，为殖民地带来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种植园这种大规模的合作企业形式，代替了原有的个体生产方式，打破了印尼传统的、分散的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促进了印尼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及城市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殖民地社会的印尼开始向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社会过渡。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扩张的加剧，荷兰人在行政上和军事上采取种种步骤全面控制了印尼群岛。这在客观上又造成了各岛屿在政治上的统一。

殖民统治的这些作用，在深受荷兰人压迫和奴役的印尼人头脑中形成了“统一的印度尼西亚民族”这一观念。他们认识到，要想推翻殖民统治，获得自身的解放，就必须

须超越种族的分歧，实行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团结。二十世纪初，在辛亥革命、十月革命和亚洲其他国家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下，印尼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一九一三年，列宁在《亚洲的觉醒》一文中专门谈到了印尼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革命民主运动现在又遍及人口近四千万的荷属印度——爪哇岛等荷属殖民地。”

“这个运动的代表者：第一、是爪哇的人民群众，他们在伊斯兰教旗帜下掀起民族运动。第二、是资本主义在熟悉当地风土气候的欧洲人中间培养的当地知识分子，这些欧洲人是主张荷属印度独立的。第三、是爪哇和其他群岛上的很多华侨，他们从本国带来了革命运动”。<sup>1</sup>

但是，印尼群岛上长期以来存在着复杂的种族和多种文化，造成了民族、文化、宗教的分裂和错综复杂的矛盾。例如：爪哇族与“外岛人”的矛盾，伊斯兰教与世俗之间的冲突和穆斯林内部革新派与守旧派的分歧等等。这些分歧与矛盾不可避免地传染了印尼的民族运动，使这个运动的内部从一开始就产生了各种政治派别。这就向民族运动的领导者提出了种种课题，要求他们具备善于调解与联合的才能，设法将多种多样的传统揉和在一起，使民族运动统一思想，将各种支流服从于反抗荷兰殖民统治和建立一个印度尼西亚民族的崇高目的。二十年代，当苏加诺开始他的政治生涯时，等待着他的就是这样一种形势。

苏加诺于一九〇一年六月六日生于爪哇。从很小的时候开始，“苏加诺就怀有拯救国家，反抗殖民主义以及为人类创造空前伟大学说的理想。”<sup>2</sup>他痛恨荷兰的殖民统治，深感受人欺负和歧视的耻辱，决心为维护民族自尊心，推翻殖民统治，恢复个人与民族的尊严而斗争。一九二六年，苏加诺从万隆工学院毕业后不久，就投入了民族运动。他意识到这个运动内部四分五裂的状况，并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政治思想。同年，苏加诺发表文章《民族主义、伊斯兰教、马克思主义》，在论述了印尼民族主义中存在的各种因素以及推动各个不同党派的三种主要思想——民族主义、伊斯兰教和马克思主义之后，他认为，要想有效地与殖民政权相抗衡，各派政治力量就必须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他对民族主义的看法是，它不是按照人种、语言、宗教或疆域来下定义的，而是从一个共同的历史，“一种愿望，一种要生活如一个人的渴望”中产生出来的“一种精神和一种基本的人生观”。<sup>3</sup>在这篇文章中，苏加诺试图建立一种能包括所有印尼人观点特征的思想体系。在以后的年代中，他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调和主义的思想。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杰出的民族运动领导人（而不是理论家），苏加诺的政治思想中是有不少可取之处的。他注重学习外国人的思想，但他决不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他善于把这些思想与印尼的国情结合起来。虽然有人认为苏加诺的政治思想是一个杂乱的，不成系统的混合体，但他的不少观点在当时却有很大的吸引力，并对印尼的民族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确受到了各种思想的影响，包括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民族主义、宗教和本国文化传统的影响等等。能把这些不同的思想结合起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它也恰恰说明了苏加诺政治思想的特点。

不仅是在思想上，而且在早期的政治实践中，苏加诺就已经显露出在政治上搞平衡的才能。他与各种党派和政治团体的人士保持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他的演说才能对听众有很大的感召力，使他的政治观点能够广泛地深入人心。一九二七年七月，成立了印度

尼西亚民族主义协会，这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民族主义团体，苏加诺被选为该协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不仅为他发挥政治才能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场所，也进一步提高了他在民族运动中不断增长的声望。在这个组织中，他致力于消除民族运动中的分歧，促进和谐，将各派政治力量团结在一起。同年十二月，苏加诺的政治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成功地创立了印度尼西亚民族政党组织同盟会。这是一个由许多不同组织组成的团体。虽然它是松散的和不稳固的，但在当时，要想把各派观点协调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例如，有人主张与荷兰人合作，逐步取得独立，有人却坚决反对合作，苏加诺本人属于后一种观点）。因此，这个组织的建立，在印尼民族运动中的确是一项不小的成就。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军队赶走了荷兰人，占领了印度尼西亚。这期间，苏加诺为日本军政府工作。不管人们对他在这一时期工作所提出的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指责如何，苏加诺在日本人和民族主义者之间再一次成功地保持了一种平衡。一方面，他也喊过亲日的口号，并为日本人的统治服务。另一方面，他又与民族运动的地下组织保持联系。他惯于采取这种策略，即把日本人还没有十分肯定的诺言套在他们头上，使日本人想要把头缩回去就不免多少有些困难了。不管怎么说，在为日本人工作的三年中，苏加诺为民族运动的发展积蓄了力量，为印尼的独立奠定了基础。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的节节胜利，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在印尼各阶层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苏加诺宣布印度尼西亚独立。八月十八日，通过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宪法，苏加诺和哈达（荷兰留学生、专家治国论者、马斯友美党魁、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分别当选为正、付总统。随后，经过几年武装反抗英国、荷兰的武装干涉，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荷兰被迫正式承认了印尼的独立。一九五〇年八月十五日，苏加诺宣布成立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荷兰对印尼先后长达四百多年的殖民统治终于结束了。

## 二、独立初期的共和国及“有领导的民主”的形成

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七年，共和国实行议会民主制度。这是一个政治上动乱的时期，是各派政治力量在国家独立的新形势下的适应和过渡时期。从五〇年开始，内阁在八年中变更了八次，国家政策缺乏连续性，并且由于议会制度而受到种种限制。虽然已经获得了政治独立，但政权却是松散的和不完善的，民族资产阶级“控制了政府并不等于控制了整个国家。至少是在开始，关键的生产部门、军队、警察和国家机构的重要部分，仍然具有很大的地方性，可以用来抵制中央政府的领导。”<sup>4</sup>另外，由于过去几年的战争和动乱，整个工农业生产在这一时期仍未恢复到战前水平。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的生产水平只及战前的百分之六十五——百分之八十，某些工业生产还在百分之五十以下。<sup>5</sup>印尼的经济仍然“基本上以私人企业为主，经济结构与殖民地时代很少有不同，……贸易对象和进出口货物的性质与殖民地经济时是一样的”。<sup>6</sup>

总之，政府在这段时间内的治国政策不能说是成功的。国家的政治生活不健全，政党和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分裂严重地存在，国家依旧贫穷，通货膨胀日益加剧，经济在

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外国，人们开始对议会制政府感到不满。

一九五七年二月，苏加诺总统提出了一个方案，主要内容是组织“纳沙贡”政府，即由民族主义者、宗教人士和共产党人三方面共同组成的政府，和成立民族委员会。民族委员会主席由苏加诺担任，它是一个广泛代表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和各种团体的组织，对政府起指导和监督作用。

苏加诺认为，几年来印尼政局不稳的根本原因在于错误地实行了西方的民主制度，这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民主，它不符合印尼的国情，印尼需要那种能够产生活力的协商精神，能够带来社会繁荣的政治和经济的“有领导的民主”。因此，要用“有领导的民主”代替西方的自由民主（实际上，就是把权力集中在苏加诺一人身上）。

苏加诺方案立刻受到了马斯友美党和印尼社会党等资产阶级右派政党的攻击，它们要求印尼国民党领导的第二届阿里·苏斯特罗阿米佐约政府辞职，马斯友美党命令它的党员退出政府，另一右派政党白尔蒂伊斯兰教党也命令它的党员联袂退出。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则要求政府全面改组。政府发生了危机，阿里总理被迫辞职。此外，自从一九五六年以來，地方上的反政府叛乱一直持续不断。在这种情况下，一九五七年三月十四日，苏加诺总统宣布全印度尼西亚处于战争和紧急状态（即紧急状态法令），四月四日，苏加诺组织了“超国会非常事务政府”，从而在组织上确立了他所主张的“有领导的民主”。随后，苏加诺下令解散了制宪议会，恢复赋予总统全权的一九四五年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宪法（一九五九年）。

这一连串果断的政治行动，是苏加诺经过几年的等待和观望后做出的。在此之前，他虽然是共和国的总统，却没有实权。他对议会制度及其加在总统权力之上的种种限制感到不满。他观察、利用着各派之间的分裂，他不时地发表演说，干预政府事务，以抬高他在政治上所偏向的人和自己的地位。现在，“有领导的民主”使他作为总统的权力大大加强了，又该轮到他在政治舞台上扮演主角了。

当时，印尼国内的主要政治力量有印尼国民党，马斯友美党，伊斯兰教师联合会和印尼共产党。在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印度尼西亚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印尼国民党得票最多，为百分之二十二，马斯友美党百分之二十，伊斯兰教师联合会百分之十八，印尼共产党百分之十六，<sup>7</sup>成为国内最大的四个政党。这次选举表明了印尼共产党的力量正在迅速发展。

印尼共产党自一九二〇年成立后，积极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经过一九四八年“茉莉芬事件”的损失以后，到五十年代中期，印尼共的政治力量和威信日益恢复。五六年二月，该党已有一百万党员。在一九五七年举行的全国地方议会选举中，印尼共得了最多的选票（百分之三十四），由五六年普选时的第四大党变为第一大党<sup>8</sup>。

除了政党以外，印尼国内还有一支极为重要的政治力量——陆军。

印尼的陆军是在一九四五年宣告独立后，为反抗外国武装干涉和捍卫国家独立而组建起来的。它在这个斗争中曾经立下了功劳。议会制度期间，政府曾打算削减军队和军费开支，这引起了军人的强烈不满。他们谴责政府的腐化、无能和忽视军队的利益，许多军官都认为应当废除议会制，新制度应当允许军人在政治上起更积极的作用。由于握有军事实力，军队在帮助苏加诺建立“有领导的民主”的新制度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下面将专门讨论这一时期军队的情况及其与苏加诺的关系。

### 三、苏加诺总统与军队

一九五七年宣布实行“紧急状态法令”之后，苏加诺开始依靠陆军的力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一九五八年，苏加诺借陆军之手平定了西苏拉威西和西苏门答腊反对现政权的地方叛乱。J·D·莱格在总结这次行动时说：“就总统而言，他终于保住了他本身的独立地位和采取行动的有效力量。……”军队在这次行动中加强了自己的地位，“总统和军队成为政权中的主要合作者。”在这次叛乱中，苏加诺的主要政敌——马斯友美党，由于勾结叛军而受到牵连，已不再是一支强有力的力量，两年之后与印尼社会党一起被苏加诺禁止了。

一九五九年，苏加诺宣布恢复一九四五年宪法之后，军人在政府中取得了合法的和正式的权力，而在这之前它一直只是在后台施加影响。苏加诺任命了七名军官为新的内阁成员，军人在议会中取得了席位，并且掌握了几个省份的控制权。此外，军队还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并从苏联购买大量武器。

军队作用的加强，更重要的是表现在经济方面。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在解放西伊里安运动的浪潮声中，印尼政府接管了国内总计十二、五亿美元的荷兰资产。国家资本所占比重由一九五七年以前的百分之四一跃增长到百分之四十六<sup>10</sup>。军人利用执行“紧急状态法令”所赋予的权力，很快就控制了大部分国家资本。当时有四百五十名军官充任原属荷兰资本的国营企业，尤其是国营贸易公司、种植园和石油公司的经理、付经理等职务。后来，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五年，印尼分别接管了一部分英国和美国的企业，又被军人所控制。印尼国家资本向着官僚资本的性质转化。一九六五年，印尼的官僚资本约有十六——二十亿美元，其中大部分属于军人集团。他们控制了全国几乎半数以上的种植园，掌握了由印尼人经营的最大的印尼国民石油公司和大部分国营贸易公司，垄断了进出口和航运事业，势力伸展到工业、农业、陆上交通和邮电等各个部门<sup>11</sup>。由于这种巧取豪夺，陆军内部的上层开始变为一个官僚买办资本家的集团。苏哈托在苏加诺时期控制着民间工业部的轻工业，后来又向商业部门伸展，他还拥有一批药房。纳苏蒂安拥有的资金达数千万美元<sup>12</sup>。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军人集团在具有滋长资产阶级营养基（私人经济成份）的条件下，不可能不向资产阶级阶层转化”。<sup>13</sup>

总之，到一九六五年时，印尼军队在国家生活中所占的分量和起的作用，除了缅甸和巴西之外，几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军队都不能与之相比拟。在许多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军队都是直接掌握政权，但是它们的统治性质都属于上层军事专政。在印尼，一九六六年之前军队没有建立军事专政，没有推翻政府，但它的作用和影响是极大的，因为它扎根于社会，同社会结构融为一体。这也是它能够在一九六六年以后掌握政权一直到今天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有人可能会问，苏加诺在共和国刚刚成立时就是国家总统，后又身兼全国武装部队最高司令，但他为什么没能够控制军队呢？

这个问题主要是由于苏加诺本人的经历和印尼的社会情况造成的。首先，苏加诺从

来都不是一个职业军人，他是在党派斗争的漩涡中起家的。一九四五年以前印尼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运动，基本上不是依靠武装斗争，而是依靠党派的政治活动。其次，一九四五年印尼宣告独立，有着特殊的国际背景。日本人的突然投降，使荷兰没有做好重新恢复殖民统治的准备。因此，印尼可以说是在殖民统治的缝隙中宣告独立的。不象中国、南斯拉夫等其他一些国家，苏加诺没有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和掌握足够的武装力量，就在国内确立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再其次，印尼军队是在一九四五年——一九四九年捍卫独立和反抗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斗争中由各种地方部队组建的。它从一开始就在地方上拥有独立性很大的政治、经济权力，并在群众中享有“国家的保护者”的声誉。根据一九四五年宪法规定，苏加诺名义上虽然是武装部队最高司令，但由于军队的这种地方性和独立性，他始终无法把自己的政治权力与陆军的指挥权融为一体。最后，一方面由于建国后陆军的上层开始向大资产阶级方面转化，另一方面，一九四九年以后，特别是在“有领导的民主”时期，苏加诺保护印尼共的政策，使陆军右派高级将领强烈不满，苏加诺与陆军领导人的关系更加紧张。

就个人来说，苏加诺是一个具有理想主义气质的政治家，他是靠调解、说服和演讲，靠唤起人们的“高尚的精神”来维持统治的。从根本上来看，他从来没有过很强的实力，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经济上。他只能借助和操纵具有实力的人物的力量，“不象政党、军队和其他派系，苏加诺没有他自己的组织力量的基础，他必须顺应这群拥有力量的人物，并尽最大的可能来利用他们为他本人的目的服务。”<sup>14</sup>他相信他的“有领导的民主”能够把这些力量揉合在一起。美国研究印尼问题的学者哈罗尔德·克罗奇曾多少带些赞扬的口气写道：“苏加诺从来都不是一个嗜血的统治者”。<sup>15</sup>的确，正是这个“优点”，使他看不清他正在试图调解的矛盾的根本性质和政治现实的残酷性。有“实力”的人物或许暂时能够顺从他，一旦他触及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时，他们就会推翻他，因为他并没有真正能够阻止他们这样做的力量。

苏加诺对陆军力量的不断增强越来越感到不安。为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力，他必须借用陆军的力量，但同时又担心陆军的野心太大，企图联合他的政敌马斯友美党和哈达组成军人政府，这将大大削弱他的地位。对于军队来说，它也不得不暂时利用总统的名声和合法性来体现自己的力量。因此，军队和总统之间的关系是既合作又斗争。废除议会制和禁止了马斯友美党之后，它们形成了一个暂时的权力轴心。虽然它们是共同维护新制度的伙伴，但它们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它们同时又是新制度下权力的竞争者。

#### 四、苏加诺的平衡政策

“有领导的民主”开始之后，苏加诺身边最亲密的政治伙伴和支持者们大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职业政治家，他们能够在上层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中显身手，而无法为他提供与陆军维持平衡所需要的基层群众的支持。这以前，苏加诺虽然与陆军一起把政党推出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废除议会制），但并不希望把它们完全消灭。他认为，印尼国民党，印尼共产党和伊斯兰教师联合会是三个有代表意义的政党，它们将会成为他的纳沙贡社会中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宗教在组织上的保证。更重要的是，他

希望这些政党能支持他反对陆军，特别是得到印尼共的支持，因为它比其他党派更能动员群众，也更怕陆军。因此，作为抑制陆军的手段，苏加诺转而与印尼共联合，对印尼共采取怀柔政策。在“有领导的民主”期间，苏加诺一直企图利用印尼共作为政治天平上的一个法码，来维持他的政治平衡。

当一九五七年印尼共在地方议会选举中获得最多的选票时，苏加诺阻止了印尼国民党与马斯友美党结盟以共同反对印尼共的计划。一九六〇年政府颁布的“农业基本法”(The Basic Agrarian Law of 1960)，使印尼共可以在农村中建立组织，农民甚至公开抢占土地，使得政府在地主阶级中失去了威信。军队、警察和其他党派也开始支持地主。一九六〇年七月，印尼共发表了一个对内阁的极为尖锐的批评。随后，包括艾地在内的印尼共中央政治局的全体成员受到陆军的传讯，另一位印尼共领导人苏基尔曼被捕。苏加诺很快就进行了干涉，说服陆军释放了他们。八月，陆军在南苏门答腊、南加里曼丹和南苏拉威西禁止了印尼共的活动，苏加诺又一次进行了干涉，陆军被迫取消了禁令。陆军和总统在印尼共的问题上形成了某种均势，双方都不愿意，也不敢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于是，出现了一种相对稳定但并不很轻松的平衡，印尼共成为这个平衡的关键因素。

一九六二年七月，印尼收复西伊里安的武装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荷兰不得不同意重新谈判。军队在西伊里安运动中得到了很大加强，人数已经超过三十万，并从苏联得到了大量的武器装备。由于西伊里安运动的胜利以及成功地镇压了一九六一和一九六二年西爪哇和苏拉威西的叛乱，军队的威望进一步提高。这时，苏加诺又试图削弱陆军的实力。一九六三年年中，苏加诺任命了与他关系较好的亚尼为陆军参谋长，而坚决反共的原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则改任没有实权的国防与安全部长。一九六三年五月一日，印尼正式接管了西伊里安，同时废除了自一九五七年以来一直实行的“紧急状态法令”，这一行动实际上是取消了陆军在该法令下所拥有“维护安全”的几乎是无限的权力<sup>16</sup>。

苏加诺任命亚尼，造成了军队领导人之间的矛盾（亚尼与纳苏蒂安之间的矛盾以及亚尼的支持者与纳苏蒂安的支持者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使军队与总统和印尼共的政治争夺中处于不利地位，这恰恰是苏加诺此举的用意所在。这之后，苏加诺一方面继续维护印尼共的利益，一方面又避免把亚尼推向不得不采取行动的地步，军队由于内部不团结和缺乏共同的策略而退居守势。

在“有领导的民主”时期，为了维持政治平衡，苏加诺还利用改组和重新任命的办法，培养了空军、海军和警察对陆军的独立性。虽然空军、海军和警察支持陆军反共，但它们更怕陆军权力的加强会威胁它们自身的地位。此外，它们中大部分爪哇军官对总统个人无比崇拜，他们把自己与苏加诺的关系比做儿子与父亲的关系。

在苏加诺的支持下，到一九六五年时，印尼共迅速发展，它的合法地位得到了恢复，在议会中取得了席位，党员人数已有三百万，它的青年组织Penmuda Rakjat也有三百万成员。此外，还有两千万人左右的其他群众组织<sup>17</sup>。当时的西方观察家认为，印尼共已成为政权的一部分，它在政治上已经掌握了主动，很快就会掌握整个政权<sup>18</sup>。

由于印尼共的日益壮大，使军队在经济上与政治上的利益受到直接的挑战，印尼共与军队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个矛盾至少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对于地方和政府机构

权力的竞争，第二、军队在各方面依赖外国（特别是美国）和印尼共的反帝政策，第三、军队控制了印尼的经济和印尼共攻击军队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腐化分子和国家的诈骗犯，第四、在土地问题上的斗争和双方都在农村寻找支持。

一九六五年初开始，印尼国内的政治空气紧张起来。一月，印尼共主席艾地向总统提议把工人和农民武装起来组成“第五兵种”，接着，又提议军队“纳沙贡化”，实际上是要在军队中实行由共产党人担任的政治委员制度，这是对陆军权力的直接挑战。三月，在印尼共的要求下，苏加诺改组了内阁，撤换了内阁中的反共成员。与此同时，自一九六〇年基本农业法以来，印尼共在农村领导的土地运动一直持续不断。一九六五年五月，由印尼共领导的农民在抢占土地时打死了一名退役军士，亚尼在部下的压力下，宣布不能再忍受印尼共的挑战，对当事农民进行了审判。这个行动表明陆军坚决地拒绝了建立“第五兵种”和军队纳沙贡化的建议。

在这种困难的局面中，苏加诺使出全部手腕维持总统——陆军——印尼共这个政治三角关系。他在演讲中批评议会民主制度不适合印尼的国情，强调他的“有领导的民主”，不断重复以合作为中心的“建国五原则”（信仰上帝、人道主义、民族主义、人民主权和社会正义）。他总是使人捉摸不定，总是先发制人。他一方面暗示陆军内部有人阴谋反对他，同时又允许陆军出版自己的报纸。他一面赞同第五兵种的设想，同时又并不让它真正建立。他大谈“纳沙贡”，同时又把它弄得不起实际作用。他说道：“我所指的是武装部队的所有机构都必须服从纳沙贡的精神和团结，”<sup>19</sup>而不是建立纳沙贡的组织。

但是，尽管如此，各种矛盾继续尖锐化。在“第五兵种”问题上，印尼共坚决要求，陆军坚决反对，苏加诺在口头上支持印尼共，双方关系愈加对立，又因为国家经济的濒临崩溃（见本文第五节），在这种气氛中，苏加诺的健康状况一度突然恶化。一九六五年八月十四日，在接见一个由陆军准将朱哈托诺（Djuhartono）率领的代表团时，苏加诺突然呕吐，身体衰弱得不能继续进行会见<sup>20</sup>。苏加诺的衰弱提醒了每一个人，这位“国父”和“伟大的革命领袖”并不是不朽的。整个九月，政治空气极为紧张，在总统健康状况恶化和各种关于政变的谣言的气氛下，武装部队准备在十月五日建军节这一天举行大规模的庆祝仪式，向印尼共在同年五月举行的四十五周年盛大庆祝活动挑战。两万人的军队集中到了雅加达，局势一触即发，陆军正在寻找向印尼共最后摊牌的机会。

## 五、政治平衡与经济建设

在“有领导的民主”时期，苏加诺虽然能够运用极好的政治直觉和敏锐的判断能力在反对者之间进行说服和保持暂时的平衡，但他可能很少认真考虑过应当把独立之后的印度尼西亚建设成一个怎样的国家（至少在他的行动中没有反映出来）。他满足于维持现状，而不愿意实行国家的社会改革，只是空洞地谈论“继续革命”，“新兴力量和腐朽势力”等政治口号，力图促使其人民通过这些口号把国家建设工作推向前进。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实现伟大的印度尼西亚民族这个概念。他憎恶西方，同时又钦佩西方技术上

的成就。但他没有认识到，工业技术需要经济发展作为基础，并且这也必然要牵涉到社会的变革。

如果说苏加诺对经济问题一窍不通，这还可以原谅。然而，他似乎根本不重视国家的经济建设。他喜欢富丽堂皇的场面，外国的援助不是用在国家急需的经济建设项目上，而是用来兴建豪华的建筑物。他对经济问题的看法是很幼稚的。他说：“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我是一个革命家。……关于经济问题，我的看法和意见是简单的，确实非常简单。……如果生活在干旱、荒芜沙漠中的国家也能够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为什么我们就不能？”<sup>21</sup>在这样一位总统领导下，这一时期印尼糟糕的经济状况就不难理解了。

苏加诺片面地强调取消外资，而不注意发展国家自身的经济。在收复西伊里安运动中，印尼虽然没收了大量荷兰资产，但却缺乏良好的管理，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使国家付出了灾难性的代价。外汇收入锐减，通货膨胀已经接近百分之一百<sup>22</sup>。随后的外汇管制，对国营贸易公司的支持和削弱私营经济（主要是削弱中小商人和企业主，而不是军人掌握的大官僚资本），以及一九五九年的货币“改革”和试图削弱华侨在乡间零售贸易中所占的优势，更加助长了这一趋势。其结果是“私人企业开工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下，贸易和商业萧条，以农业为主的印度尼西亚却遭受着食品短缺，政府欠下了大量外债（主要是欠苏联），城市人口中有一千五百万失业者。”<sup>23</sup>据统计，按一九六〇年固定价格计算，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印尼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一多一点，几乎处于停滞状态<sup>24</sup>。而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率只有百分之二点二。这种经济发展状况，对于一个已经取得政治独立，而且已经掌握了强大的国家资本的国家来说，确实是够糟糕的。此外，上层阶级的腐化生活和贪污盛行，引起了中下层群众的广泛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哈达等人主张节省开支，裁减军费和接受外援的比较自由的经济发展政策。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表示愿意提供五千万美元的贷款，美国也准备增加援助<sup>25</sup>。但是，苏加诺却有他自己的想法。利用收复西伊里安运动以及一九六五年发动的“粉碎马来西亚”战役（Crush Malasia），他想把陆军的注意力从对印尼共的逐渐强大的担心上转移开，进一步维持他的国内政治均势。他认为由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而指定的经济改革会加重国内的对抗，并使国家落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因此，不断地制造小规模的危机比发展经济的计划更容易使他获得支持并更有利于维系他的政治三角关系。

到了六十年代，苏加诺已经不具备独立斗争中的那种创造性和革命的理想，他操纵政治平衡的技巧是为一种保守的目的服务的。就是说，保护现存的上层统治阶层的地位。玩弄策略和政治把戏已经比政治纲领的实质还重要。当他充分地施展这方面的才能时，却不可避免地被眼前的这些争斗牢牢地束缚住了，他已经没有时间来考虑国家的前途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用J·D·莱格的话说：“当他在反抗殖民统治时，他有一个很清楚的，可识别的敌人，也有一个胜利之后将是怎样的结局的概念。当他攻击议会民主制度的时候，他能看到它的真正缺点，虽然当时对其补救的办法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当他一旦当了权，由于受到各种力量——他自己也是其中之一——的制约，他的

清晰的视野就模糊了。”<sup>26</sup>

一九六五年九·三〇事件前后，印尼的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一九六三和一九六四连续两年，仅是国家预算赤字本身就已经超过了国家财政总收入。<sup>27</sup>一九六五年，国民生产总值只有九十五亿美元，平均每人只有九十元。<sup>28</sup>虽然一九六五年的国家收入能够支付预算中计划花费的百分之七十，但另外又通过了一项未公布的、完全由总统控制的“特别预算”（Special Budget）<sup>29</sup>，从而使实际上的预算赤字持续上升。据统计，这一年的预算赤字为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百，而一九六六年头三个月的预算赤字几乎就已经达到了一九六五年全年的数量。<sup>30</sup>通货膨胀率一九六三年为百分之一百一十五，一九六四年为百分之一百三十四<sup>31</sup>，一九六五年为百分之五百<sup>32</sup>。通货膨胀的加剧，是由于政府滥发纸币引起的。一九五〇年十二月的货币流通量为二十五亿多盾（印尼货币单位），一九六五年底增至二万九千八百二十亿盾<sup>33</sup>。在这种情况下，印尼政府不得不提高生活日用品和服务性消费的价格，这又使得物价飞快地上涨：

雅加达生活费用上涨表（1957、3—1958、2为100%）<sup>34</sup>

	食物	住房	穿衣	其他
1964、7	2673	1742	5399	2810
1964、8	2953	1825	5773	3063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政府宣布汽油价格从每升四个盾上涨到二百五十个盾。六六年一月三日，再次宣布汽油涨价四倍，做饭用的煤油价格也同时上涨。此外，邮政和电话、电报费用增长了十倍，火车费增加了四倍，雅加达的公共汽车费增加了五倍<sup>35</sup>。

不可避免的物价上涨引起了公众的普遍不满。一九六六年一月，在陆军的支持下，几千名印度尼西亚大学的学生爆发了反政府的示威游行，抗议物价上涨，要求解散印尼共、清洗内阁中的亲共人士。这表明他们对政府已经丧失了信心。苏加诺虽然在这次示威中未受到直接的攻击，但他所领导的政府的能力和他本人的威信已经受到了公开的怀疑。而在九·三〇事件之后，他已经再也没有能力发动任何政治运动来转嫁国内的危机了。

## 六、暂时的平衡与根本的冲突

在“有领导的民主”时期，苏加诺之所以能够暂时地维持平衡，主要是和当时陆军与印尼共各自本身的情况及其所执行的政策有关，苏加诺的政治手腕只能在这种情况下有条件地发生作用。

印尼的陆军与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不同，这些国家的军队反对同帝国主义有联系的上层阶级。而在印尼，在“有领导的民主”时期，军队已经把自己看做是国家的政治力量和现存制度的一部分，在这个制度中，它能够加强自己的影响，并获得特权，而不必去搞政变。总的来说，它是满意这个制度的。只有当它感到制度向前发展威胁到自己的利益时，才决定要推翻这个制度。另外，在陆军内部，许多军官不愿意支持陆军领导人的政治行动，怕损害自己的既得利益。虽然军队反对印尼共，但又不愿意反对它

的保护者苏加诺总统。因为他们害怕鲁莽的行动会被苏加诺利用而对他们不利。总统的声望在武装部队许多部门甚至陆军本身都很高。陆军的权力不仅受到海军、空军和警察的制约，也受到陆军内部不团结和军官之间个人竞争的消耗。最后，不少军官仍相信他们在军事上的优势，认为在近期内对共产党采取重大行动还不必要。

下面再谈谈印尼共的情况。

到九·三〇事件之前，苏加诺实际上禁止了除印尼共以外的其他所有政党。一方面，苏加诺为对付陆军力量的发展，需要印尼共的支持。另一方面，由于苏加诺的“宠爱”，印尼共却过份地依赖了他的保护。到一九六五年，印尼共的组织和影响虽然大为加强，但仍然很有限，前途并不光明。它被排除在拥有很大权力的“最高作战指挥部”（在“粉碎马来西亚”战役中建立）之外，在八十名内阁成员中只占四名<sup>36</sup>，并且没有掌握地方省份的领导权，在政府中没有获得支持的基础。它的力量来自游行示威而不是武装抵抗，它严重地依赖苏加诺的“善意”，无形中已经被苏加诺当成了政治平衡的工具。如果印尼共在这一时期能够在内阁中变成主要力量，并在地方政府中获得较多职位，它才能具有合法性和足够的力量，使陆军不得不在将来认真对付它。实际上，出于对苏加诺政权的幻想，印尼共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而努力的。但它似乎却完全忘记了以武装斗争的一手来对付资产阶级可能发起的进攻。此外，印尼共自一九六三年以来开始在农村发动了抢占土地的大规模宣传活动，使农村中的中小地主阶级起了戒心，从而进一步疏远了印尼国民党和伊斯兰教师联合会，丧失了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支持，削弱了自己的力量。

苏联作家格·伊·米尔斯基在引用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苏联《真理报》文章的观点时认为：“印尼共‘背离了马列主义学说’，接受了毛泽东武装斗争的思想，从而‘削弱了党对群众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影响，实际上使它在各种反共力量的联合进攻面前失去了自己的抵抗能力’。”<sup>37</sup>

这种明显的反中国的观点看来十分牵强附会。“接受了武装斗争的思想，就会削弱党对群众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影响。”这个推理在逻辑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一九六五年，印尼共正是因为认识到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可惜认识得很不够），才向苏加诺提出了建立“第五兵种”的建议和军队“纳沙贡化”的要求，它们遭到了陆军的强烈反对，因为这样做会大大加强印尼共在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力量和影响。不错，一九六五年九·三〇事件以后，印尼共在各种反共力量的联合进攻面前确实缺乏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但这难道是“接受了武装斗争的思想”而造成的吗？事实恰恰相反。一九五六六年，印尼共产党五届四中全会上，竟把“通过议会道路以和平方式达到社会主义”作为印尼共产党的路线<sup>38</sup>。党的领导“越来越陷入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的形式中去”，<sup>39</sup>在实践中“没有使党的整个队伍、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为应付非和平道路的可能性做好准备”，<sup>40</sup>“党在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中越来越丧失了独立性”。<sup>41</sup>由此可见，正是由于没有坚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没有建立有组织的群众武装力量，印尼共在斗争策略上的这一失策，是众所周知和显而易见的。就连米尔斯基本人也不得不承认道：“印尼共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支持苏加诺，巩固他的制度，一面又反对这个制度”，“犹如

用一只手与之战斗，而另一只手还和它拉着”，“只能用一半力量进行这个斗争。”<sup>42</sup> 总之，由于印尼共在策略方面的错误，使苏加诺得以暂时地维持他的政治平衡，但结果却使印尼共自身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个教训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共产党应当记取的。

九·三〇事件和对印尼共的大屠杀，苏加诺权力的逐步被剥夺和军人政权的建立，标志着苏加诺政治平衡政策的最后破产。通过下面的分析将可以看出，这种苦心经营的策略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要失败的。

“有领导的民主”开始以来，作为平衡的一方的陆军领导人，通过“紧急状态法令”，“西伊里安运动”和“粉碎马来西亚”战役等一系列国内外危机，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管理的各个部门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势力，把大量的国家财产据为己有，加上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已经成为一个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集团。这个集团的利益不可避免地要和印尼共产党代表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冲突。但是，陆军和印尼共都是靠苏加诺“有领导的民主”来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的，双方都拥护现有的社会制度。陆军想要维持现状，当然是为了保住它的既得利益，印尼共也拥护苏加诺的制度，但它却坚决主张改革其中的官僚资本主义性质。双方都想以同一种社会制度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并且排挤对方，又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希望寄托在这个制度的最高代表者苏加诺身上，并且也由于双方都有一定的力量，而不敢对对方贸然采取行动。这种情况是苏加诺的制度得以暂时存在的一个原因。但是，双方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一方面要使国家的权力为一小撮大资产阶级服务，另一方面要使国家政权为人民群众服务，使国家成为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矛盾触及到各自的根本利益，因此是不可调和的，它决定了这场斗争的性质：“反动势力对于人民的民主势力的原则，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针对这种情况，人民的民主势力对于反动势力，亦应采取同样的原则”。<sup>43</sup> 甚至连西方的资产阶级学者也看出了这种矛盾的不可避免。克罗奇写道：“除了一方的胜利和另一方的被消灭，陆军领导人与共产党人之间的对抗不可能有任何其他的解决办法。”<sup>44</sup> 陆军领导人可能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而印尼共则在这个问题上犯了致命的错误。

因此，苏加诺是靠着陆军与印尼共这两种政治力量建立了“有领导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是以两种互不相容的力量为基础的，同时又不可避免地要使它们之间的矛盾尖锐化。而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性，最终只能以一方的被消灭来解决。当这个制度被砍掉一根支柱时，它自然就要倒塌下来。所以，“有领导的民主”一开始，苏加诺就使自己陷入了一种不可自拔的困境中，他最终无法解决他亲手建立的制度中所存在的弊病。因此，这个制度从一开始就是没有前途的，它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此外，在经济上，苏加诺对独立后的国家建设束手无策，他只是想保住现有的权力和地位，不愿意，也不可能对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根本性的改造，经济政策反而被用来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结果使得国家的经济状况越来越恶化，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群众中出现了普遍的不满情绪，对政府的信任发生了动摇，这种情况随时可能被有政治野心的个人或集团利用。更重要的是，印尼共和陆军本来就代表着互相对立的经济利益，随着经济状况的恶化，双方都力图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且指责对方，使这种对立更加尖锐化，从而导致了国内政治矛盾的进一步恶化，这是苏加诺政治平衡政策不可避免的

后果之一。

上述情况恰恰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毛泽东同志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的革命，他们可以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大资产阶级后面”，<sup>45</sup> 成为他们的“尾巴”的可能。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害怕进步力量的壮大，一方面又反对大资产阶级，从而想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一条不偏不倚的“中间道路”，这种想法已经被证明是行不通的，民族资产阶级只能完成它特定的历史使命，苏加诺最后竟成为他自己扶植起来的两种政治力量的牺牲品，这并不奇怪。日本电台形象地评论道：“……苏加诺总统象是骑着军部和共产党这两匹马，迄今为止是巧妙地驾驶着。……这两匹马开始各自走不同的方向，……驾驶这两匹马一弄不好就会成为‘二马分尸’。”<sup>46</sup> 他虽然能在某一段时间内和某种程度上成功地玩弄政治平衡的技巧，但这样的平衡是极为脆弱的，它必将由于矛盾的激化而被打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sup>47</sup>

## 结 束 语

从二十年代踏入政界到一九五〇年印尼共和国成立，苏加诺在民族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他的政治理想和个人才能符合了当时印尼社会的总的要求，民族运动中的各派政治力量有可能暂时地放弃自己小团体的利益，团结在苏加诺所树立的民族主义旗帜下。时代需要这样一个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民族主义者和高度协调能力的人物，他也按时来到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才能与社会需要相结合，苏加诺成功地推动了印尼的民族独立，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民族运动领袖。然而，社会是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的需要也是在不断变化的，苏加诺却没有使自己的思想跟上这种变化的需要。他在独立后的国家建设中表现得动摇不定，软弱无能，缺乏应有的战略眼光和明确的治国纲领。过去的思想和才能不适用于现在的社会条件。因此，作为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和言行是不会超越于他那个阶级的局限的，他的历史使命也是具有一定限度的，他终将被另一个新的时代所淘汰，而不以某个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1 《列宁选集》第二卷，P447
- 2 O. G. 罗德：《微笑的将军》 P 6
- 3 J. D. 莱格：《苏加诺——政治传记》 P69
- 4 James F. Petras, “New Perspectives on 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 in the Peripher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5 (3) 1975, PP. 304-305.
- 5 张肇强：《战后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和经济》 P91
- 6 Bruce Glassburner, “The Economy and Economic Policy: General

- and Historical”, 《The Economy of Indonesia》1971, P4
- 7 莱格: 同前, P275
- 8 北大东语系: 《印尼民族解放运动简史》P95
- 9 莱格: 同前, P307—308
- 10 北大东语系: 同前, P106
- 11 同上, P126—127
- 12 同上: P141
- 13 格·伊·米尔基斯《“第三世界”: 社会、政权和军队》P302
- 14 莱格: 同注9
- 15 Harold Crouch: 《The Army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1978) P128
- 16 Crouch: 同上, P54—55
- 17 Guy J. Pauk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Asia》(1969) P279
- 18 Crouch: 同前, P69
- 19 Berita Yudha (Army, published in Indonesia) 29 May 1965
- 20 Testimony of Brigadier General Djuhartono at Subandrio Trial (I, 163)
- 21 莱格: 同前, P347
- 22 J.A.C. Mackie, “Problems of the Indonesia Inflation”, (1967) P30
- 23 Rex Mortimer, “The Downfall of Indonesian Communism”, 《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69》(1969) PP209—210
- 24 吴志生、林淑娟: “印尼国家资本初探”, (南洋研究所科学讨论会材料)
- 25 Mackie: 同前, P30—37
- 26 莱格: 同前, P409
- 27 Penny: “Survey of Recent Development”, 《Bulletin of Indonesian Economic Studies》No.2 (September 1965) P1—15
- 28 同注24
- 29 Penny: 同前
- 30 The Statement of the Sultan of Yogyakarta on 4 April 1966.
- 31 Penny: 同前
- 32 同注30
- 33 南洋研究所: 《东南亚五国经济概况》(1976) P150—151
- 34 “Quarterly Economic Review of Indonesia”, No.51, Jan, 1965, P5
- 35 Crouch: 同前, P165
- 36 同上, P95
- 37 米尔斯基: 同前, P113—114
- 38 《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五篇重要文件》P45
- 39 同上,
- 40 同上, P46
- 41 同上, P58
- 42 米尔斯基: 同前 P115
- 43 毛泽东: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选第四卷, P1181—1182
- 44 Crouch: 同前, P21
- 45 毛泽东: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选第二卷, P635
- 46 北大东语系: 同前, P136
- 47 毛泽东: 《矛盾论》, 毛选第一卷, P321